

承传与开新： 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知识状况考察

刘正伟 饶鼎新

【摘要】 民国初年,在实施新教育的形势下,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革悄然而起。首先,它在承接清末以古文教育为主导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响应时代的呼唤引入了现代应用文字;其次,在文章观念变革和美育思想的推动下,清末不被重视的骈文辞赋和诗词等美术文字受到了青睐,被选入绝大多数中学国文教科书;再次,出于传承本国文化的自觉和保存国粹的需要,中学国文教科书开始积极选择并收录经史、诸子等传统旧学内容。换言之,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制已表现出对传统古文教育的疏离,呈现出由古文、现代应用文字、美术之文和传统旧学等内容构成的新旧交织的知识状况,从而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文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中学国文教科书;实用古文;美术之文;传统文化

民国初年,伴随着教育领域的革故鼎新,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革悄然发生,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知识状态。它一方面承接了清末以实用古文为主导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引入现代应用文字的知识内容。在文章观念演变及美育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体制上不再恪守“黜华崇实”的古文理念,转而吸收清末一向不受重视的骈文辞赋和诗词等美术之文。同时,在清末民初教育转型中,鉴于传统旧学在普通教育领域日渐式微,出于文化承传和保存国粹的自觉,中学国文教科书开始选录经史、诸子等国粹之文。概括地说,民初,实用之文、美术之文和国粹之文重构了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知识状况。

一、实用之文:清末古文教育观念的承接和现代应用文字的引入

晚清以降,桐城派古文家在对传统繁杂的古文文体进行改造整理后,抽绎出了更为精简、适用且易于教学的古文文体系统。姚鼐将古文文体分作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种,而曾国藩则在此基础上将文体损益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牋、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种,并按照文体的功能,划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类。

刘正伟,教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杭州 310028);饶鼎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28)。本文系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计划“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的研究成果。

按照桐城派古文家改造过的新古文文体编辑的古文选本在晚清后期国文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新政以后,清政府先后颁布壬寅、癸卯学制,一方面赋予国文教育专门的学科地位,强调国文教育的旨归在于“以资官私实用”^①;另一方面将桐城派的古文“义法”理论和“清真雅正”的文体风格确定为古文训练的法则与准绳。由是,桐城派的古文文体分类及其选文系统成为清末中学国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然也成为中学国文教科书编制的参照标准。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提出中学国文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②。但要旨对于普通、高深两类文字并没有作进一步阐述,而教育界对此也争论不已。“普通文字”与“高深文字”之间界定不清、边界模糊使得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无所适从。由于社会上仍以使用文言文为主,担任中学国文教员的又都是“一班老先生”,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大多数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与学习“普通语言”没有关系。^③1915年,教育部设教科书编纂处并出台《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其中对中学国文科“讲读文章”的一项作出如下规定:“文章分记叙(叙记、典志、传状、碑志、杂记皆属之)、论议(论说、叙跋、书牋、奏议皆属之)、词赋(诗赋、颂赞、哀诔、箴铭皆属之)三类选授,不拘时代,以清真雅正,切于实用为准。”^④不难看出,这一内容范畴无论在文体分类、选文标准,还是教学取向上,都可以看出清末中学古文教育的痕迹。换言之,民初中学国文教育仍然以桐城派古文的目标、体系为宗。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选文“诸体略备”,使学生“知古人体裁之门径”“明体制之要”“辨识文章之流别”。同时强调应当教授古人“作文义法”或“作文理法”。刘法曾、姚汉章编辑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和许国英、张元济编辑的共和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都对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常见的论辩、序跋、奏议、书牋、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等实用文体大力收录,两套教科书分别选有上述文体作品316篇和224篇,占选文的大部分。尽管其中部分文体在民初政权更迭之后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但这两套教科书并没有刻意回避。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对此解释说:“时代派别于四册中大略具备。故不合时宜之文体(如民国政府对诏敕、奏疏文已不行之类)……亦存一二,以为潜发文思之助”^⑤,认为保留这些文体的目的在于呈现文章发展的时代派别。但稍后出版的《新制国文教科书》(谢蒙,中华书局,1914年)则对古文文体进行重新确定,删去了奏议、诏令、哀祭三类不合时宜文体,增加了杂文、书教、纪事三种文体,有意改变传统古文文体脱离现实需求的状况,强化古文文体学习与日常生活应用的联系。

随着民初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古文文体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表达需求,一些国文教科书编者指出,“矧值共和建设,一切文字应用时异势殊,非复申改涂抹所能供给”^⑥,开始关注社会上流行的“公文、程式、条陈、通告之类”的现代应用文字。而有识之士更直接提出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当“以应世为先”,以满足“人生日用所需”为取向,表示“公文程式”“章程规则”“序传记述”等应用文体“正是吾人立身处世所必要”^⑦,并努力加以实践。陆基编辑,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学新国文》(1913)就将各类现代应用文字编入教科书选文之中,并对其格式、内容、适用范围和写作要点详

①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00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69页。

③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号,第20页。

④ 教科书编纂处:《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教育研究(上海1913)》,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5年第24期,第41页。

⑤ 许国英、张元济:《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4页。

⑥ 许国英、张元济:《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第一册),第1页。

⑦ 陆基:《中学新国文》(第一册),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1页。

加指示。《中学新国文》共有选文 175 篇,其中现代应用文字共有 19 篇,涉及的文体类别多达 15 种,包括训令、公函、咨文、规程、说帖、民呈、官呈、辩诬书、布告 9 类行政公文,12 篇选文,以及电文、颂词、演说、合同、章程、募启 6 类日常应用文体,7 篇选文。《中学新国文》中行政公文相对较多,这与民初行政公文改革及民主政体实行密切相关。民国成立后,共和政权废止了封建制度下通行的奏、议、章、表等传统公牍文书,代之以令、布告、状、咨、公函、呈、批 7 种现代公文。^① 为了适应政治改革需要,普及新式公文写作格式与规范,《中学新国文》对上述 7 种公文中的训令、布告、咨文、公函、呈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写作指导,同时为了满足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又增加了规程、说帖和辩诬书 3 类比较常用的公文。而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合同、章程、募启、颂词、电文、演说等应用文,编者不仅悉数收录,而且反复强调其在参与现代生活时的重要价值。譬如合同,编者指出,“订立合同,为办事起点,不得不审慎对待”^②;再如“颂词”,他表示“近日颂词之用甚繁,虽为应酬笔墨,亦不可不知其作法也”^③。而在语言的使用上,这类应用文字虽然仍以文言为主,但其中的一些选文已经开始掺入白话或外来词汇,体现出吸纳当时的“活语言”的倾向。

除了满足学生日常应用之需外,《中学新国文》中选录的现代应用文字实际上还渗透着共和政治中民主、平等的进步观念。在解释“说帖”时,编者指示,“凡人民对上,有所建白,皆可用之”^④,表明民众可以自由向政府抒发政见。各类公文中,大总统及参议院等专用的公文体裁未见设置,一些文体上下均可使用,如咨文,“大总统与参议院,或国务院与参议院,往复书文,均用咨文,各省官吏对于省议会之往复,现亦用咨。又各部院,对于各省都督民政长,内外往复,亦仍用咨。”^⑤在语言使用和格式规范上,官民之间也无需区别对待,如官呈即特别申明,“为某事下,不必用窃字,每幅行数,官民一律,均用六行。”^⑥显示了民主国家建立不久,社会的平等精神。

二、美术之文: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骈文辞赋和诗词

以“实用”为取向的清末中学国文教育对于骈文辞赋和诗词等美术类作品并不重视。早在 1902 年,张謇就提出将国文教育划分为“适用国文”与“美术国文”两类,他从养成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角度指出,“国文必期适用,与美术国文有别”。而后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制定的《大学堂编书处章程》规定分开编写文章课本与诗学课本,关于文章课本的编写意见认为,“‘奏议论说’之文皆理胜,‘词赋记述’之文皆辞胜”,要求文章课本选文应以“理胜于辞为主”^⑦。1904 年,癸卯学制将诗歌教育摒弃于中学国文课程的知识体系之外,并奉行桐城派“黜华崇实”的古文教育观念。受此影响,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几乎不选诗词,而对于骈文辞赋的态度也莫衷一是,或视骈文为“文章之一体”,略“採录一二”^⑧,或是采取“弃骈从散”^⑨的策略,或表示“一概不录”^⑩。但这种将国文一分为二,重实用而不重美术的观点,在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发生了较大改变。《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有诗歌 184 首,辞赋 32 篇,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则选有诗歌 30 篇,辞赋 13 篇,刘宗向的《国文读本》

①北洋政府于 1912 年十一月初七日颁布的《临时大总统公布公文程式令》,明确了令、布告、状、咨、公函、呈、批七种公文的具体格式和适用范围。

②陆基:《中学新国文》(第四册),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 年,第 50 页。

③陆基:《中学新国文》(第一册),第 41 页。

④陆基:《中学新国文》(第四册),第 51 页。

⑤陆基:《中学新国文》(第四册),第 55 页。

⑥陆基:《中学新国文》(第四册),第 55 页。

⑦张謇:《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经济丛编》1902 年第 9 期,第 2 页。

⑧潘博:《高等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广智书局,1906 年,第 4 页。

⑨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年,第 2 页。

⑩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年,第 2 页。

(1914)虽没有选辞赋,但却收录诗歌148首,词21首,而《新制国文教本》则不选诗歌,但收录辞赋7篇,就连以“人生日用所需”为选文旨趣的《中学新国文》也选有辞赋和诗歌共21篇。各种教科书对于骈文辞赋和诗词积极主动地吸收,使得向来不受重视的美术之文成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重要的选文来源。在坊间教科书编写努力的推动下,1915年,教科书编纂处颁布的《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明确将“诗赋”列为了中学国文科的讲读内容之一,并针对词赋、诗歌的选择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词赋诗歌,宜选雅而不艳、质而不俚者。(词赋,如《登楼赋》《酒德颂》《归去来辞》可读,《别赋》《恨赋》不应选;诗歌,如古时《十九首》《大风歌》《雁门太守行》《庐江府史妻作》及陶潜诗,皆可读。齐梁新体,不应选,唐宋以来近体诗,佳者律细意隐,难于讲明,亦不必选)。”中学国文教科书对收录诗赋等美术之文态度发生转变,主要源于当时两股力量的推动:

一是清末以来“骈散融合”的文学思潮。晚清以来,古文家已经认识到,文章本无骈散之分,而优秀古文佳作往往都是骈散结合的。曾国藩就明确指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①。因而,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大致形成的共识是“不拘成见,骈散兼列”。同时,古文教育传统发展到清末民初在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欧化两种潮流的夹击之下,其空间不断被挤压。骈散融合既可化解古文教育中的“门户之见”,又有助于拓宽古文写作的道路,提高文章教育的效果。

二是新式教育理念的传播,尤其是美育思想的传入。清末,王国维在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提出了教育应从智育、德育、美育、体育四端入手培养个体精神和身体发达且调和的“完全之人物”^②。民国成立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将美育视作新式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随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针对中小学国文课程,蔡元培指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根据国文教育的性质,其中“美育当占其二十五”^③。教育部也提出:“各种教科关系美育者,惟图画、音乐、文学三者最为要紧”^④。针对国文教育,有关学者则指出,“写景摭情之作……以其有境界有韵味,故其入人也深,而亦最适于儿童之所好。国文科之美育之效用强半系于是。”^⑤随着美育合法地位的确立,诗赋等美术之文,因具美育价值和对人的感情全体之发达的重要作用,被视为普通教育中美育的“正轨”。

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不仅努力化解骈散之别,还极力扭转以往国文教育“黜华崇实”的风气,对骈文辞赋的作法、风格予以积极肯定的评价。《新制国文教本》说:“凡文章有形式之美,有内容之美;形式之美在辞藻,内容之美在义理”,从正面肯定辞藻骈俪之作具有形式上的美感。而《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也从肯定的角度评析骈赋作品。如在评点庾信的《春赋》时称,“六朝小赋每以五七相间成文”,十分“生动可喜”^⑥;又认为屈原的《九歌》“情深、文明、节短、韵长”;鲍照的《芜城赋》“遒鍊瑰丽,赋家绝境”。中学国文教科书对于骈文词赋结构、词汇、语言的肯定,在引导学生参考、借鉴其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诗歌,各种教科书除肯定其美术价值外,更注意宣扬其蕴含的美育功能。教科书编者所谓的“涵养性情,宣导血气”“助美术、共吟讽”“节宣堙郁”等观念与美育中提出的“感情完全发展”“精神全体发达”的教育旨归是相一致的。民国初年中学国文教科书收录的诗词作品,大致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新派诗和词四类。对选有诗歌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国

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7),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②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1906年第56号。

③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1卷第10号,第10页。

④朱有瓚、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⑤余觐:《美育论》,《教育杂志》1913年第5卷第6号,第77页。

⑥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第80页。

文读本》和《中学新国文》四套教科书统计之后发现,古体诗收录的数量最多,包括古诗和古代民歌两类,共计 183 首,近体诗位居第二,包括绝句、律诗共 169 首,近世诗数量较少,仅有 13 首。四种教科书中,只有刘宗向的《国文读本》选有词作,共 21 首。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之所以更加重视古体诗,原因在于其形式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与力避雕饰的古文审美有相通之处,内容又多偏于记叙、抒情,有助于学生情感的浸润与陶冶,如刘法曾、姚汉章评论选文《古诗十九首》时便说,“大率逐臣弃妇以及朋友聚散存亡之感,中间愿言或寓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人哀乐无端,俯仰自失。”^①在古体诗中,古代民歌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类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是民族国家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近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两类。由于律诗有着严格的对仗和押韵要求,清末《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要求中小学生“万不可读律诗”^②。但是,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并不受这一观点束缚,反而在近体诗的选择上偏向于律诗而非绝句,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和《中学新国文》甚至只选律诗而不选绝句。律诗篇幅相对更长,适合程度较高的中学生阅读,而其在形式结构与声调韵律上精心雕琢能让学生感受到语言文字形式与声乐之美。近世诗主要选择了黄遵宪、梁启超和谭嗣同三人的作品,反映近代诗歌创作的特点。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常将西方文明新事物、新观念化作诗歌创作的新“诗料”,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推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如《读陆放翁集》;谭嗣同的作品则多联系佛学思想,希望以此充实国人的精神世界,如《感旧二首》。这些新派诗歌所采用的新“诗料”,表达的新意境、新精神,除了体现诗歌创作发展追求的文言一致和内容革新外,也带给了学生不同于传统诗教的新的审美经验。

三、国粹之文: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旧学的接纳与改造

清末中学堂课程体系于中国文学科外专门设有读经讲经科,且课程分量较大,故中学教科书选文多不及经书,又因中学国文教育以文章为根本,编者或从文道一统的古文观出发,认为史家之文“隳突姿肆,无复规检,不足以明道”^③;或从写作技法的角度指出,史书除了《史记》和《汉书》可供取法外,其他的“盖可读者少矣”^④,所以,对史部作品的选择多集中于少数著名的篇章,范围十分有限。同时,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要求文学作品以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作为旨归,^⑤而其所谓的“道”多以儒家思想学说为内核,故易与孔孟思想相抵牾的诸子作品也就很难进入教科书选文的视野。但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冲破了上述编撰限制,转而开始积极选录经史和诸子之文。刘宗向的《国文读本》收录经史、诸子选文最多,共计 186 篇,其次为《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计有 92 篇,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新制中学国文》《中华新国文》分别选有 52 篇、19 篇和 12 篇,这些教科书一反传统,主动收录经史、诸子之文,其背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清末新政在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普通学校分科课程体系过程中,确立了中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教授“普通之学”,而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传统旧学作为“专门之学”被纳入大学堂的课程体系之中,因而对中学教育的影响日益衰弱。在《奏定中学堂章程》厘定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几乎没有子部之学,中学历史科的课程内容与由史书典籍构成的史部之学也并非同一回事。集部之学中只有部分与传统古文教育有关的文集、文论被中国文学科接纳。而经部之学,虽在官方中小学课程体系

①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第58页。

②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2页。

③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第一册),第3页。

④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2页。

⑤王独慎:《意境空间与性情涵养——清末修身教科书插图中的德育内涵》,《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55页。

中得以相对系统的保留,但反对之声不绝于耳。^①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②,在同日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中学校所开列的14门课程中已经没有了读经一科。^③ 1912年5月,教育部正式下文“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随着民初中小学读经科的废止,传统旧学除了集部之学外,几乎都失去了作为普通学校教育合法知识的地位,本国学术传承在普通教育领域也就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

对于旧学的式微,知识界一方面担心西学东渐会造成本国学术的衰弱,使得本国学者成为被西方思想学说牵着走的“学奴”^④,另一方面则顾虑旧学不传,束书不观,会使“士风日趋于浅陋”^⑤,出于以上种种担忧,许多学者极力呼吁“保存国粹”。而民初宣布废止中小学校读经科,则激起了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反对。其中既有保守派出于保皇的目的反对废止读经,如康有为、严复等,也有出于保存文化、昌明国粹的目的主张不完全抛弃经学,如杨昌济虽认为教育部废止读经“自有其教育上的理由”,但他指出,“经书所载乃吾国固有之文化,其关系于青年之德育尤为深切”^⑥,不赞同完全将经学抛弃。事实上,教育行政当局要求废止读经的目的主要在于反封建,而非自绝旧学,因此各界也积极寻求补救。陆费逵提出可以打破经学内容的整体性,依据学科课程属性分配经学内容:“其中的精义格言,采入修身课本可矣;其中的治平要道,编入法政大学及专门法政学堂的讲义可矣;其中可资风诵的古雅文章,选入国文读本可矣;其中古史所征的事实制度,作为讲习历史的参考可矣。”^⑦他的主张得到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⑧ 而后杨昌济也提出,“当由明习经术之士,取经说之极精要者,编入国文教科书及修身教科书之中”,达到“无读经之名而有读经之实”的效果。^⑨ 对于教育界主张保存国粹,存续旧学的强烈诉求,后来继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明确表示,新教育不是要“以新区别于旧”,新教育的要义应是“保存国粹与适应时势”^⑩两方面的结合。

的确,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对于保存国粹,存续旧学十分重视。他们普遍认为经文之中确有可节取的内容,于是主张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兼收群经,以存国粹”^⑪。其次,他们对“周秦诸子”和“国语国策”等其他国粹内容也积极加以接收与改造,认为“古所以立言之道,泽之经子,参之史志,博观于后来,则可以整其流变,知其所归也。”^⑫

在经学之文的选择和接受上,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各种教科书大多都兼收群经。由于民初教育界对于小学不应读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因此,大部分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希望借由经学选文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儒家各类经书。刘宗向的《国文读本》对十三经均有收录,其余教科书则分别涉及其中的11经(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10经(《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7经(《新制国文教本》)和2经(《中学新国文》)。而清末中小学读经课中并不作要求的《公羊传》《谷梁传》和《尔雅》也被部分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所选录,可见其对经学典籍广泛涉猎的姿态。

①张之洞因而感慨,“今日略知西法,办学堂者,动谓读经书无益废时,必欲去之,百喙一谈,牢不可破。”见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12页。

②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07页。

③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09页。

④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第14页。

⑤章太炎、刘师培:《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1907年第1期,第6页。

⑥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湖南教育杂志》1913年第17期。

⑦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1911年第8期,第70页。

⑧1912年4月蔡元培在回答某记者有关是否主张保全吾国经史旧学的提问时就表示:“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见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⑨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

⑩范源濂:《说新教育之弊》,《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7期,第8页。

⑪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3页。

⑫谢无量:《新制国文教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第1页。

表 1 民初主要中学国文教科书对十三经的收录情况

中学国文教科书 十三经名目	《中华中学 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 《国文读本》	《新制中学国文》	《国文读本》	《中华新国文》	收录次数
《春秋·左传》	15	7	4	17	4	47
《公羊传》	1	1	—	12	—	14
《谷梁传》	2	1	—	5	—	8
《尚书》	5	2	1	3	—	11
《周易》	1	3	1	1	—	6
《诗经》	8	2	—	16	—	26
《论语》	2	2	1	3	—	8
《尔雅》	—	—	—	1	—	1
《孟子》	4	5	1	11	4	25
《孝经》	—	—	—	1	—	1
《周礼》	4	3	1	2	—	10
《仪礼》	—	1	—	—	—	1
《礼记》	4	2	2	24	—	32
总篇数	46	29	11	96	8	190

其次,在经书内容的选择上体现了民初中学国文教育的目标。《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国文要旨,一方面注重学生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强调从思想观念层面对学生智、德进行启发。教育部 1914 年颁布的国文等科应采之方针,提出国文教育要注意“整理思想”和“重叙事文”^①,同样是针对学生思想训练和表达能力两方面提出的要求,并指示教科书编纂会依照此原则审查各类教材。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对于传统经学内容的选择,自然无法回避国文科的学科属性和教学需求。为了落实中学国文科的教育目标,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在十三经的选择上表现出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等偏于历史纪实的经书和《孟子》《论语》《周易》《尔雅》《诗经》《孝经》等以思想、道德、文化阐发为主的经书的重视,收录出自上述经书的选文多达 147 次,约占总数的 77%。相比之下,以记述礼俗规范为内容的《周礼》《礼仪》《礼记》的选录数量就少了很多,仅有 43 次,约占总数的 23%。不仅如此,各种教科书对于儒家“三礼”具体内容的择取也十分注意,有意避免出现与民初民主、共和思想相违背的内容。

第三,在《论语》和《孟子》两部儒家经典的选择上,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体现出重《孟子》而轻《论语》的特点。对于《论语》,各种教科书的选取篇目仅限于《先进篇》节录、《微子篇》节录、《季氏将伐颛臾》等 5 篇,共出现 8 次。但对《孟子》的选择则计有《梁襄王章》《良臣民贼章》《民贵君轻章》等 19 篇,出现 25 次,陆机的《中学新国文》干脆完全不选《论语》中的内容。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之所以对孟子青睐有加,因为相比于孔子所看重的礼义之道,孟子所倡导的仁政爱民、民贵君轻、忧患意识等思想更加符合共和政体提倡的民主、共和的意识形态。恰如当时的教科书编者所言:“《孟子》一书,民贵君轻之谈,良臣民贼之辨,声合于今日之共和政体、民国主义。而表率之功,实自袭美……学者不可不晓。”^②不难看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给予《孟子》的高度认可,其主要目的在于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民主共和的观念,从而将民主共和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关联,促进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

^①教育部:《修身、国文、教育、乐歌等科应采之方针,饬知教科书编纂会依照审查》,《教育研究(上海 1913)》1914 年第 15 期,第 7 页。

^②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 102 页。

表 2 民初主要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史部与子部选文统计^①

中学国文教科书 史部、子部名目		《中华中学 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 《国文读本》	《新制中学国文》	《国文读本》	《中华新国文》	收录次数
史部	《国语》	8	5	1	18		32
	《战国策》	16	4	2	1		23
	《史记》	13	5		9	2	29
	《汉书》	5			1		6
	《资治通鉴》		2	1	17		20
	《新唐书》				4		4
	《续资治通鉴》				3		3
	其他				10		10
	总篇数	42	16	4	63	2	127
子部	《庄子》	3	3	1	7	2	16
	《韩非子》	1	1	1	3		6
	《列子》		2		1		3
	《荀子》		1	1	6		8
	《管子》			1			1
	《孙子》				1		1
	《墨子》				3		3
	其他				6		6
	总篇数	4	7	4	27	2	44

随着民初旧学整体性的肢解与衰落,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开始从“文化”而非“文章”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史部作品的教育价值,因而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将历史上体例各异的史书吸收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范围之中。除了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涉及的《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之外,《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新唐书》《明史》等史书也被纳入了教科书的选辑范围之中。各套教科书选录的史部作品的数量达到 127 次,而其中最受古文家认可的《史记》和《汉书》仅有 35 次,不及总数量 1/3,选录数量最多的史书是《国语》,共计 32 次。各套教科书中对于史部之文收录最多的是刘宗向的《国文读本》,共涉及 13 部史书中的 63 篇选文。如此大规模地选录史家作品是因为在编者看来,“厉行明史”不仅可以矫治当时“皮传西语伪说”的学术风气,而且对于民族国家认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国人明史,则亡灭之难,虽亡,有复机。”^②

由于民初新教育方针明确提出反对尊孔读经,认为“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③。因此,中学国文教科书不再以儒家学说作为统一的思想之宗,而是将诸子学说也纳入中学国文教科书之中,从而建构起一个互相争鸣、激荡的话语空间。这一转变不仅呈现了我国古代百家争鸣的多元价值,也与当时民主、自由、包容的时代精神相呼应。因此之故,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都在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有所出现。在诸子当中,被收录最多的是庄子,共出现 12 次。各种教科书中收录的庄子选文主要体现了重视生命(《尧以天下让许由》)、顺应天道(《养生主》)、无为而治(《马蹄篇》)等主张,这些观点恰好与儒家推崇的舍生取义、仁义劝导、礼乐教化等观念针锋相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对儒家学说定于一尊作用,也反映了共和社会尊重个体价值和提倡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①史部中其他一栏包括《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竹书纪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高士传》。子部中其他一栏包括《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古今注》《拾遗记》。

②刘宗向:《国文读本》(第一册),长沙:宏文图书社,1914 年,第 2 页。

③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第 11 页。

四、结语

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在知识选择上积极主动地转向现代应用文字,使得中学国文要旨中“通解普通语言文字”的目标不再是一纸空谈,为中学国文教育从学习古文逐步转向学习普通文字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教科书中收录的骈文辞赋和诗词作品,相对于传统实用古文而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属性,对于实现陶冶学生感情、落实美育、涵养文学兴趣等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各种教科书中选择性地收录经史、诸子之文,既满足了本国传统文化、学术传承的需要,又在语言学习、道德维系和思想改造上发挥了应有的教育功能。

(责任编辑:程天君 石亚兵)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Zhengwei, RAO Dingxi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reform began to take place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education, some textbooks accepted modern practical genres as a part of their selected tex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Second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ideas and the thought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texts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refined styles(such as parallel prose and poetry), which had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gradually favored by the textbook compiler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need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textbook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egan to select and absorb the traditional scholastic learning. In other words,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owed some alienation of traditional ancient Chinese prose education, and presented a new structure with the mixed contents from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dern practical genres of texts, highly artistically stylized texts and traditional scholastic learning,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practical ancient Chinese prose; highly artistically stylized texts; traditional culture

About the authors: LIU Zhengwei,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 RAO Dingxin is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